

外资进入能否提升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基于 OECD 跨国企业活动数据的再检验

王文治¹，路优²

(1. 天津师范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387; 2. 南开大学 经济学院, 天津 300071)

摘要: 本文基于 OECD 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 运用区分内外资的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构建企业层面的全球价值链指标, 实证检验了 FDI 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 FDI 总体上抑制了中国企业进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提升, 其中企业吸收能力呈现正向调节作用, 企业全球价值链嵌入呈现负向调节作用。异质性检验结果显示, FDI 促进了内资企业出口全球价值链位置和外资企业进口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升级, 对一般贸易和西部地区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提升的抑制作用较显著, 非港澳台地区外资对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负向影响较强。

关键词: 外商直接投资; 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 吸收能力; 全球价值链嵌入

[中图分类号] F425; F75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4034(2022)04-0137-17

引言

在全球价值链 (Global Value Chain, GVC) 这一新的国际分工形态下, 产品生产环节被分割于不同的国家 (地区), 其中发达国家长期占据研发设计等高附加值环节, 在 GVC 分工中获取由于其主导地位带来的巨额收益; 而发展中国家在 GVC 分工中则多受制于发达国家, 长期处于微笑曲线的低端, 大量承接加工装配等低附加值环节 (屠年松, 2019)。2016 年 12 月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的《关于加强国际合作提高我国产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指导意见》提出当前国内相关产业总体仍处于 GVC 的中低端, 与发达经济体仍存在较大差距^②。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的

[收稿日期] 2022-01-10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中国省域碳排放权的初始分配及其政策模拟: 基于三种碳排放责任界定原则下的评估与比较”(17YJC790157)

[作者简介] 王文治 (1978—), 男, 山西太原人, 天津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贸易与环境政策; 路优 (1996—), 男, 江苏徐州人, 南开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 国际投资、全球价值链

②中国政府网: http://www.gov.cn/xinwen/2016-12/06/content_5144158.htm#1。

冲击下,中国更要应对全球价值链、供应链、产业链断裂的风险,并不断提升在GVC中的位置,从而增强产业的国际竞争力。

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在中国对外开放中担当着重要角色。一方面,FDI规模不断增加。2020年在新型冠状病毒性肺炎疫情影响下,流入中国的外资仍然增长了6.2%(UNCTAD, 2021);另一方面,外资引进政策不断完善,对FDI的准入限制持续放松。《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先后经历了六次修订,2020年发布的《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进一步增加了外资鼓励条目数量。2021年3月1日商务部印发《关于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做好稳外资工作的通知》,将稳定外资数量与提升外资质量作为工作核心。

事实上,一国GVC参与程度及其位置与吸引更高质量FDI的能力相关(Amendolagine等, 2019)。随着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的迅速发展,吸引高质量的外资愈发重要,其有助于全球市场中生产要素的最优配置以及GVC的不断升级(Su和Fu, 2021)。理论上,一国可通过吸引外资以克服资本、技术和知识的相对匮乏,从而融入GVC,并通过外资的技术溢出效应实现本土企业GVC的升级(Fernandes等, 2020)。然而多数发展中国家引进的外资多流入加工装配等环节,容易产生GVC“低端锁定”效应,进而使国内企业被锁定在GVC的低端环节。外资进入是否提升了中国企业在GVC中的地位,已有研究对此尚未达成一致。鉴于此,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的OECD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AMNE),运用微观企业数据就FDI对中国企业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影响实施再检验,深入探究其中的原因与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

关于FDI对全球价值链位置影响的文献数量丰富,结论不尽相同。部分研究认为FDI提升了一国GVC的位置。Grosse(1996)研究认为FDI通过人才培训效应实现技术溢出,进而提升本国产业价值链升级。Javorcik(2004)、Fernandes和Paunov(2012)研究均发现FDI通过上下游产业关联效应提升本土企业的GVC位置。李怡和李平(2018)使用行业层面数据,发现FDI能够显著提升中国GVC地位,且这种影响具有FDI动机、来源地、制度环境以及行业方面的异质性。相反,部分研究则认为FDI对于GVC的位置具有负向影响,加剧“低端锁定”困境(Su和Fu, 2021)。罗伟和吕越(2019)对比了不区分所有制情景与外资完全退出情景下增加值的变化,结果发现外资进入使得中国制造业向GVC的下游移动。李平等(2018)基于行业层面的跨国数据研究发现FDI不利于东道国摆脱“国际分工陷阱”,但适度嵌入GVC有利于脱离这种陷阱。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研究认为,FDI通过增强GVC嵌入程度抑制了企业出口生产链位置而提升了企业进口生产链位置。陈艺毛和李春艳(2019)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发现FDI渠道的溢出效应抑制了制造行业GVC地位的提升,但是吸收能力起到了正向调节作用。此外,部分研究认为FDI对于东道国GVC位置的影响不确定。张宇和杨松(2020)基于可再生能源行业跨国数据,发现FDI对于GVC位置的影响具有吸

收能力门槛效应,高于门槛时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低于门槛时具有显著的负向效应。

已有研究结论差异较大,原因在于:第一,FDI通过人员培训效应、竞争效应、产业关联效应等途径影响技术溢出效应,而这些途径的作用方向不尽相同,导致外资对于东道国GVC位置的影响不确定。第二,东道国吸收能力存在差异。东道国行业(企业)吸收能力越强,FDI对于GVC位置的提升作用越强;反之,FDI对于GVC位置的提升作用受到抑制,甚至表现为负向作用。第三,当前测度GVC参与度或位置的指标多基于行业层面,忽视了企业异质性,而企业层面的指标则基于海关进出口数据进行构建(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Chor等,2021)。囿于数据限制,多数GVC参与度和位置指标测算未区分内外资,潜在假定同一行业内资和外资具有相同的技术水平与投入产出系数,事实上这一假定并不符合现实,进而使相关GVC指标测算产生误差(Wang等,2021)。

综上分析,本文的边际贡献包括:第一,充分考虑内资与外资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使用OECD-AMNE数据库提供的区分内外资的投入产出表,在行业内资与外资增加值贸易分解的基础上构建内资与外资企业进出口GVC位置指数,从而使研究结论更加可靠;第二,将经典的吸收能力与GVC嵌入程度机制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当前围绕FDI对于GVC位置影响机制的研究多基于吸收能力视角,而鲜有基于GVC嵌入度视角的研究,即使少量文献涉及GVC嵌入度,但多基于行业层面且未考虑内外资投入产出的差异。本文基于区分内外资的微观企业数据,分别从企业吸收能力和GVC嵌入度双重视角就FDI对内外资企业GVC位置的影响实施再检验,并深入讨论过度嵌入全球价值链是否会导致FDI的GVC低端锁定效应。

二、理论与机制分析

综合已有研究可知,FDI对于GVC的影响效果受到东道国企业吸收能力的制约,同时东道国企业GVC嵌入程度也会影响FDI对本土企业GVC升级的作用效果。下文将从吸收能力与GVC嵌入的视角来探究FDI对东道国企业GVC位置的影响,进一步明确两种机制所发挥的作用。

(一) 吸收能力

1. 人力资本

跨国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中的知识多属于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东道国企业对这类知识的深入识别和消化吸收的能力体现了企业吸收能力的差异(Cohen和Levinthal,1989)。东道国的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学习与吸收跨国公司先进知识和技术的能力越强,本土企业更易于突破“学习壁垒”,产生正向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效应,进而引致东道国企业生产率提高并促进其GVC位置攀升。东道国人力资本水平越低,本土企业工人的工资溢价就越低,外资企业更容易获得高质量的人力资本,促使高水平人力资本由本土企业向外资企业流动,造成本土企业人才流失,对本土企业的生产率形成负冲击(Jude,2016),进而抑制东道国企

业 GVC 位置提升。另外,低人力资本水平的本土企业学习和吸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较弱,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溢出效应被抑制,甚至出现“挤出效应”,竞争力较弱的本土企业被挤出当地市场,存活下来的本土企业被迫接受处于优势地位的外资企业的控制,从而被锁定在 GVC 的低端环节(李怡和李平,2018)。

2. 研发能力

东道国企业的研发能力是实现跨国直接投资技术外溢的基础。东道国企业研发能力越强,其与技术前沿的距离越小,适应技术前沿的能力越强(Narasimhan 等,2006),因此可快速获取市场信息,加快复杂知识的转化,缩短研发周期,节约研发成本,提升东道国企业的创新质量与生产率(Duan 等,2021),进而提升本土企业的竞争力,实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促进东道国企业 GVC 位置的提升。相反,东道国企业研发能力越低,学习和吸收跨国公司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的能力就越弱,缺乏将跨国公司先进技术转化为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动力,技术上长期依赖从跨国公司引进,进而陷入“受制于人”和“低水平循环”的困境(肖利平和谢丹阳,2016)。鉴于此,伴随着外资进入,低研发能力的本土企业难以实现正向技术溢出效应,亦被锁定在 GVC 的低端环节。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1 吸收能力越强,FDI 对企业 GVC 位置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强;吸收能力越弱,FDI 对于企业 GVC 位置提升的促进作用越弱,甚至造成“低端锁定”。

(二) 全球价值链嵌入

除吸收能力外,FDI 对东道国企业 GVC 位置的影响亦受制于东道国企业的 GVC 嵌入程度。首先,理论上东道国企业可通过深入嵌入 GVC 来实现外资先进技术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而提升其生产率(Halpern 等,2015)。然而发达国家通过 FDI 主导 GVC,迫使东道国企业被动服从 GVC 分工,当东道国企业嵌入 GVC 程度过深时,FDI 的正向溢出效应反而会被抑制,甚至表现为负向溢出效应(唐宜红和张鹏杨,2018)。跨国公司利用自身优势地位阻碍东道国企业向 GVC 的更高端迈进,使东道国企业陷入“低端锁定”困境(唐宜红和张鹏杨,2017)。其次,当东道国企业尚未深度嵌入 GVC 时,其可通过 FDI 获取先进管理经验和高度契约精神以提升本国的制度质量(李平等,2018),而过度嵌入 GVC 容易使东道国企业受到跨国公司的牵制和控制,阻碍其制度创新,加剧“低端锁定”困境。最后,对于技术相对落后的东道国企业而言,由于先进技术的自主研发成本高于直接引进成本,大量东道国中小企业选择依赖 FDI 的技术溢出并固守在 GVC 中的现有位置。此外,FDI 在东道国加工环节中的招标引起流入高端研发部门的资金减少(Feenstra 和 Hanson,1996),且强化了东道国企业固守现有 GVC 位置的动机,进一步加剧“低端锁定”困境。综上,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假说 2 东道国企业未过度嵌入 GVC 时,FDI 有利于提升本土企业 GVC 位置;过度嵌入 GVC 时,FDI 会抑制本土企业 GVC 位置的提升。

三、实证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计量模型设定

基于理论与机制分析，本文设定基准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GVC_pos_{ift} = \beta_0 + \beta_1 FDI_{ift} + \beta_2 X_{ift} + \mu_f + \gamma_t + \delta_i + \varepsilon_{ift} \quad (1)$$

式(1)中，各变量的下标*i*、*f*和*t*分别表示行业、企业和年份。被解释变量*GVC_pos_{ift}*表示中国各行业内资或外资企业历年的进出口GVC位置指数，核心解释变量*FDI_{ift}*表示各行业内资或外资企业历年的外商投资份额，*X_{ift}*表示其他控制变量。*μ_f*代表企业固定效应，*γ_t*代表年份固定效应，*δ_i*代表行业固定效应。为控制异方差与序列相关性的影响，随机误差项*ε_{ift}*在企业层面聚类。

(二) 核心指标构建

1. 区分内外资的企业GVC位置指数

内资与外资企业在产出、增加值与贸易结构方面具有较大差异，使用区分内外资的投入产出表能够更好反映内资与外资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闫云凤, 2020)，从而更为准确测度内外资企业GVC参与度与位置。因此，本文借鉴Wang等(2021)的方法，使用区分内外资的投入产出表，其结构如表1所示：

表1 区分内资与外资的投入产出表结构

项目			中间品使用							最终品使用				总产出
			国家1		国家2		...	国家G		国家1	国家2	...	国家G	
			内资	外资	内资	外资	...	内资	外资					
中间品投入	国家1	内资	z_{DD}^{11}	z_{DF}^{11}	z_{DD}^{12}	z_{DF}^{12}	...	z_{DD}^{1G}	z_{DF}^{1G}	y_D^{11}	y_D^{12}	...	y_D^{1G}	x_D^1
		外资	z_{FD}^{11}	z_{FF}^{11}	z_{FD}^{12}	z_{FF}^{12}	...	z_{FD}^{1G}	z_{FF}^{1G}	y_F^{11}	y_F^{12}	...	y_F^{1G}	x_F^1
	国家2	内资	z_{DD}^{21}	z_{DF}^{21}	z_{DD}^{22}	z_{DF}^{22}	...	z_{DD}^{2G}	z_{DF}^{2G}	y_D^{21}	y_D^{22}	...	y_D^{2G}	x_D^2
		外资	z_{FD}^{21}	z_{FF}^{21}	z_{FD}^{22}	z_{FF}^{22}	...	z_{FD}^{2G}	z_{FF}^{2G}	y_F^{21}	y_F^{22}	...	y_F^{2G}	x_F^2
	
	国家G	内资	z_{DD}^{G1}	z_{DF}^{G1}	z_{DD}^{G2}	z_{DF}^{G2}	...	z_{DD}^{GG}	z_{DF}^{GG}	y_D^{G1}	y_D^{G2}	...	y_D^{GG}	x_D^G
		外资	z_{FD}^{G1}	z_{FF}^{G1}	z_{FD}^{G2}	z_{FF}^{G2}	...	z_{FD}^{GG}	z_{FF}^{GG}	y_F^{G1}	y_F^{G2}	...	y_F^{GG}	x_F^G
	增加值			va_D^1	va_F^1	va_D^2	va_F^2	...	va_D^G	va_F^G				
总投入			$(x_D^1)'$	$(x_F^1)'$	$(x_D^2)'$	$(x_F^2)'$...	$(x_D^G)'$	$(x_F^G)'$					

设世界上有*G*个国家(用变量的上标表示)，每个国家有*N*个行业，每个行业均分为内资(D)与外资(F)(用变量的下标表示)。*x_D¹*表示国家1内资行业总产出列向量；*va_D¹*表示国家1内资行业增加值行向量；*y_D¹²*表示由国家1内资行业生产并被国家2消费的最终产品出口列向量；*z_{DF}¹²*表示国家1内资各行业出口至国家2外资各行业的中间品矩阵，为*N*阶方阵；(*x_D¹*)'为*x_D¹*向量的转置。类似地可定义表1中其余元素。

在区分内外资投入产出数据的基础上,本文运用 WWZ 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 (Wang 等, 2013) 将行业增加值贸易从内资与外资两个角度实施分解^①。进一步借鉴 Koopman 等 (2010) 和 Chor 等 (2021) 的研究方法,分别构建内外资企业出口和进口 GVC 位置指数,如式 (2) 和式 (3) 所示:

$$GVC_pos_{ft}^X = \ln\left(1 + \sum_{i=1}^N \frac{X_{fit}}{X_{ft}} GVC_for_{it}\right) - \ln\left(1 + \sum_{i=1}^N \frac{X_{fit}}{X_{ft}} GVC_back_{it}\right) \quad (2)$$

$$GVC_pos_{ft}^M = \ln\left(1 + \sum_{i=1}^N \frac{M_{fit}}{M_{ft}} GVC_for_{it}\right) - \ln\left(1 + \sum_{i=1}^N \frac{M_{fit}}{M_{ft}} GVC_back_{it}\right) \quad (3)$$

式 (2) 中, $GVC_pos_{ft}^X$ 表示 t 年份企业 f (内资或外资) 的出口 GVC 位置,数值越高表明企业出口 GVC 地位越高,越靠近 GVC 的上游,反之则越靠近下游; GVC_for_{it} 表示 i 行业 t 年份的 GVC 前向参与度,即:间接增加值 (IV) 与总出口的比重; GVC_back_{it} 表示 i 行业 t 年份的 GVC 后向参与度,即:国外增加值 (FV) 与总出口的比重; X_{fi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出口属于行业 i 产品的总额; X_{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份的产品总出口额。式 (3) 中, $GVC_pos_{ft}^M$ 表示 t 年份企业 f 的进口 GVC 位置,数值越高表明企业进口越靠近 GVC 的上游,反之则越靠近下游; M_{fi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份进口属于行业 i 产品的总额; M_{ft} 表示企业 f 在 t 年份产品的总进口额。

式 (2) 与式 (3) 以企业在各行业的出口 (进口) 规模占企业总出口 (进口) 额的比重为权重,对企业出口 (进口) 产品涉及的各行业 GVC 前 (后) 向参与度实施加权平均,进而计算企业出口 (进口) GVC 位置指数。与以往研究不同,如企业 f 隶属于内资企业时使用内资行业的前 (后) 向参与度指数,隶属于外资企业时则采用外资行业的前 (后) 向参与度指数,进而可分别测度内外资企业出口 (进口) GVC 位置指数。

2. 核心解释变量

借鉴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8) 的做法,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是内外资企业外商投资份额 (FDI),用企业外商资本金 (包括港澳台资本在内) 占实收资本的份额表示。借鉴聂辉华等 (2012) 的研究,将份额大于等于 25% 的企业视为外资企业。

3. 控制变量

根据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主要选取如下控制变量:(1) 企业规模 (Scale): 用企业总资产额的对数表示。(2) 企业年龄 (Age): 用企业当期年份减去企业成立年份并加 1 来表示。(3) 行业集中度 (HHI): 用赫芬达尔指数表示。(4) 资本劳动比 (lnkl): 用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与员工人数比值的对数表示。(5) 全要素生产率 (TFP): 由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在 2007 年之后无工业增加值与中间投入的数据,无法使用 OP 法与 LP 法测算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故使用索洛余值法

^①篇幅所限,区分内外资的 WWZ 增加值贸易分解模型推导过程备索。凡备索资料均可登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术刊物编辑部网站“刊文补充资料查阅”栏目查询、下载。

测算。(6) 融资约束 (SA): 参照 Hadlock 和 Pierce (2010) 的方法, 融资约束指数公式为: $SA = -0.74 \times Scale + 0.04 \times Scale^2 - 0.04 \times Age$ 。(7) 资产负债率 ($Debt_Asset$): 用企业总负债与总资产的比值进行衡量。

(三) 数据来源与处理

被解释变量 (GVC_pos_{ijt}) 测算所需的投入产出数据来源于 OECD 发布的 AMNE 数据库, 该数据库包含 2005—2016 年 59 个经济体 34 个行业的区分内外资的投入产出表; 测算所需的企业产品进出口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海关数据库。解释变量 (FDI_{ijt}) 和控制变量 (X_{ijt}) 所需的测算数据来源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综合考虑不同数据库所覆盖的年度差异, 本文实证部分的研究区间为 2005—2013 年。

数据处理与匹配过程如下: 首先, 清洗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的不良数据, 将工业总产值、销售额、固定资产、实收资本等缺失和小于或等于 0 的样本剔除; 将从业人数低于 8 和缺失的企业样本删除。其次, 依次按照企业名称、邮政编码与电话号码后七位将工业企业数据与海关数据匹配后取交集。最后, 借鉴周申 (2006)、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8) 的方法, 将 HS 产品编码与 OECD-AMNE 数据库行业分类进行匹配^①。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基准回归结果

表 2 列 (1) 至列 (3) 显示了 FDI 对中国企业出口 GVC 位置的影响, 列 (4) 至列 (6) 显示了 FDI 对中国企业进口 GVC 位置的影响, 回归中分别控制了企业、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总体来看, FDI 显著抑制了中国企业出口和进口 GVC 位置的提升。这表明研究期间跨国公司来华投资主要从 GVC 下游环节嵌入 (苏丹妮等, 2020), 旨在利用中国劳动力成本优势, 将最终产品的加工组装环节放置国内, 使国内企业被“俘获”或“锁定”在 GVC 的低端环节 (王玉燕等, 2014); 伴随 FDI 流入, 企业出口 GVC 位置趋于下降。同时, 随着外商直接投资企业本土化需求的不断提升, 位于 GVC 上游位置的进口原材料商品逐渐被本土企业生产所替代; 伴随 FDI 流入, 中国企业进口 GVC 位置总体出现下降。

控制变量方面, 以企业出口 GVC 位置为被解释变量, 在同时控制企业、年份与行业三重固定效应之后, 如表 2 列 (3) 所示: 资产规模 ($Scale$) 的系数为负, 表明企业总资产规模越大, 企业出口 GVC 位置越偏向下游。其可能原因为: 尽管中国企业资产规模在增加, 但是多流入产能过剩部门而非高生产率部门, 从而降低企业 GVC 位置。融资约束 (SA) 的系数为负, 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高, 越难以筹措其发展所需资金, 企业越容易被锁定在 GVC 低端。全要素生产率 (TFP) 对于出口 GVC 位置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其原因可能是在参与 GVC 的过程中, 低生产率企业被淘汰, 而相对高生产率的企业为保证自身生存被迫处于 GVC 的低端。企

^①篇幅所限, HS 产品编码与 AMNE 数据库行业分类对应表备索。

业年龄 (*Age*)、行业集中度 (*HHI*) 的影响不显著。资本劳动比 (*lnkl*)、资产负债率 (*Debt_Asset*) 对于企业出口 GVC 位置则具有显著的正效应, 有利于企业出口 GVC 位置的提升。以企业进口 GVC 位置为被解释变量, 如表 2 列 (6) 所示, 在同时控制企业、年份与行业固定效应后, 资产规模 (*Scale*)、企业年龄 (*Age*)、资本劳动比 (*lnkl*)、资产负债率 (*Debt_Asset*) 对于企业进口 GVC 位置的影响不显著。行业集中度 (*HHI*) 的系数显著为正, 表明企业所处行业的市场集中程度越高, 该企业在进口 GVC 中越偏向上游。全要素生产率 (*TFP*) 的系数显著为正, 即企业的 TFP 越高, 其在进口 GVC 中的位置越偏向上游, 这一结果与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8) 的结果相同。融资约束 (*SA*) 的系数显著为负, 表明企业融资约束越大, 其在进口 GVC 的位置会向下游移动。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1)	(2)	(3)	(4)	(5)	(6)
<i>FDI</i>	-0.056 0*** (0.000 4)	-0.052 8*** (0.000 4)	-0.052 8*** (0.000 4)	-0.055 5*** (0.000 4)	-0.052 9*** (0.000 4)	-0.052 9*** (0.000 4)
<i>Scale</i>	0.001 2*** (0.000 3)	-0.001 7*** (0.000 2)	-0.001 6*** (0.000 2)	0.001 2*** (0.000 4)	0.000 1 (0.000 4)	0.000 0 (0.000 4)
<i>Age</i>	0.003 0*** (0.000 1)	-0.000 0 (0.000 0)	-0.000 1 (0.000 0)	0.003 4**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i>HHI</i>	0.021 5*** (0.006 7)	0.017 9** (0.007 2)	0.004 4 (0.008 1)	0.082 6*** (0.011 1)	0.030 2*** (0.009 4)	0.029 4*** (0.010 1)
<i>lnkl</i>	0.000 9***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1)	0.000 7*** (0.000 1)	-0.000 2 (0.000 1)	-0.000 1 (0.000 1)
<i>TFP</i>	-0.001 2*** (0.000 1)	-0.000 5*** (0.000 1)	-0.000 5*** (0.000 1)	0.000 9*** (0.000 2)	0.001 7*** (0.000 2)	0.001 7*** (0.000 2)
<i>SA</i>	0.004 7*** (0.001 1)	-0.002 6*** (0.000 9)	-0.002 9*** (0.000 9)	0.001 4 (0.001 6)	-0.003 5** (0.001 4)	-0.003 3** (0.001 4)
<i>Debt_Asset</i>	0.015 3*** (0.000 3)	0.000 5** (0.000 2)	0.000 6** (0.000 2)	0.012 6*** (0.000 5)	0.000 5 (0.000 4)	0.000 5 (0.000 4)
常数项	-0.073 2*** (0.005 2)	-0.052 7*** (0.004 5)	-0.020 9*** (0.004 8)	-0.076 0*** (0.008 5)	-0.060 8*** (0.007 7)	-0.053 7*** (0.009 5)
企业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行业固定效应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样本数	380 677	380 677	380 677	285 505	285 505	285 505
R ²	0.291 4	0.473 6	0.476 9	0.193 9	0.300 3	0.301 6

注: ***、**和*分别表示估计系数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括号内数值为稳健标准误,并聚类至企业层面。下表同。

(二) 稳健性检验

1. 工具变量分析

企业的 GVC 位置可能会影响外国投资者在本地市场的投资意愿与能力 (Amendolagine 等, 2019), 进而改变企业的外资比例, 因此企业 GVC 位置可能会

反向影响 FDI。为解决因上述双向因果关系和遗漏变量而产生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 FDI 的滞后一期和二期为工具变量,采用两阶段 GMM 估计方法来缓解模型潜在的内生性问题。分别以出口和进口 GVC 位置为被解释变量,工具变量识别不足检验的 LM 统计量分别为 185.7 和 77.8, P 值均接近于 0, 拒绝“工具变量识别不足”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的 F 统计量分别为 93.4 和 38.4, 均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下拒绝“工具变量弱识别”假设;Sargan 过度识别检验的 P 值均大于 0.1, 表明工具变量具有外生有效性。以上检验表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此外表 3 列 (1) 和列 (6) 的检验结果表明 FDI 对企业进出口 GVC 位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从而证明处理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2. 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

针对 GVC 位置指数, 本文分别构建两种替代指标: 其一, 借鉴闫云凤 (2020) 的方法重新构建企业层面出口与进口 GVC 位置指数, 公式分别为:

$$PL_pos_f_i^X = \sum_{i=1}^N \frac{X_{f_i}}{X_{f_i}} PL_pos_{i,u}, \quad PL_pos_f_i^M = \sum_{i=1}^N \frac{M_{f_i}}{M_{f_i}} PL_pos_{i,u}$$

其中, $PL_pos_{i,u}$ 表示各行业历年前向生产链长度与后向生产链长度的比值。其二, 借鉴 Chor 等 (2021) 的方法, 构建企业出口与进口上游度指数。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2)、列 (3)、列 (7) 和列 (8) 所示, 在替换被解释变量指标后, FDI 对企业进出口 GVC 位置仍呈现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 3 稳健性检验结果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两阶段 GMM	$PL_pos_f_i^X$	企业上游度	外商资本金对数	剔除不良样本
	(1)	(2)	(3)	(4)	(5)
FDI	-0.053 9*** (0.007 2)	-0.069 9*** (0.001 2)	-0.169 9*** (0.003 1)	-0.004 9*** (0.000 0)	-0.052 4*** (0.000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56 540	380 677	380 677	380 677	299 226
R ²	0.499 0	0.043 4	0.089 2	0.477 7	0.500 7
项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两阶段 GMM	$PL_pos_f_i^M$	企业上游度	外商资本金对数	剔除不良样本
	(6)	(7)	(8)	(9)	(10)
FDI	-0.046 8*** (0.014 9)	-0.049 9*** (0.001 6)	-0.133 5*** (0.003 8)	-0.005 0*** (0.000 0)	-0.052 9*** (0.000 5)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47 391	285 505	285 505	285 504	224 381
R ²	0.303 7	0.014 1	0.035 9	0.304 4	0.320 0

注: 所有回归均加入了企业、年份与行业层面的固定效应。限于篇幅, 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备案。下表同。

3. 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

核心解释变量 FDI 的替代指标以外商资本金与港澳台资本金之和的对数表示。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4) 和列 (9) 所示, 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指标后, FDI 系数仍为负且存在显著性, 再次验证基准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 剔除 2008 年与 2010 年样本

鉴于 2008 年金融危机对中国的贸易与国际投资产生较大冲击, 许多企业被淘汰, 以及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 2010 年的数据存在大量信息不全、数据缺失、异常值等问题, 在剔除上述两年样本后再次实施稳健性检验^①。表 3 列 (5) 和列 (10) 结果显示, 在剔除不良样本后, FDI 系数依旧显著为负, 与基准回归结果无明显差异。

(三) 异质性分析

1. 内外资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进一步考察 FDI 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的进出口 GVC 位置的影响, 表 4 结果显示 FDI 对内资企业出口和进口 GVC 位置的影响相反。从对出口 GVC 位置的影响来看, FDI 对内资企业出口 GVC 位置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外资企业出口 GVC 的提升起到抑制作用, 但作用效果不显著。从对进口 GVC 位置影响来看, FDI 对外资企业进口 GVC 地位的提升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 对于内资企业则呈现不显著的抑制作用。其原因在于: 本文研究充分考虑了内资与外资企业投入产出结构的差异性, 由于内资企业多分布于采矿与挖掘业等靠近上游的行业 (唐宜红和张鹏杨, 2018), 更容易获取生产要素, 在参与 GVC 时更有竞争力, 随着 FDI 的进入其出口产品仍位于上游的高价值链位置, 因此 FDI 进一步显著提升了内资企业出口 GVC 位置。相反, 外资企业来华多集中于加工贸易, 以价值链下游环节的最终品组装出口为主, 在东道国进口相对上游的中间品, 再将制成品出口至母国, 因此 FDI 流入显著提升了外资企业进口 GVC 位置。综上, 在构建区分内资和外资的企业 GVC 位置指数后, 实证结果表明 FDI 对内资企业和外资企业 GVC 位

表 4 异质性分析: 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内资企业	外资企业
	(1)	(2)	(3)	(4)
FDI	0.004 2* (0.002 2)	-0.000 2 (0.000 7)	-0.000 1 (0.005 6)	0.002 3* (0.001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03 567	177 110	99 963	185 542
R ²	0.395 8	0.455 5	0.148 0	0.267 9

^①为保证回归结果的完整性, 本文在基准回归部分依然加入 2008 年与 2010 年样本, 而在稳健性检验中剔除, 以对比样本量不同的情况下二者的回归结果是否具有显著差异。

置的影响呈现差异化的特征。这对于制定差异化的引资政策以提升中国企业 GVC 位置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表5 异质性分析：区分外资来源地

项目	港澳台地区外资		非港澳台地区外资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1)	(2)	(3)	(4)
<i>FDI_GAT</i>	-0.019 0*** (0.000 4)	-0.015 4*** (0.000 4)	—	—
<i>FDI_Other</i>	—	—	-0.021 1*** (0.000 4)	-0.020 6*** (0.000 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80 677	285 505	380 677	285 505
R ²	0.378 6	0.230 3	0.384 8	0.239 6

2. 不同外资来源地的影响

Buckley 等 (2007) 认为, 港澳台企业的实际技术水平与内地企业相差不大, 与西方外资企业相比其技术溢出效应较弱, 西方外资更可能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而提升中国内资企业的 GVC 位置。为检验不同来源地外资对于 GVC 位置的影响, 本文使用港澳台资本金与实收资本的比例表示港澳台地区外资 (*FDI_GAT*), 以外商资本金与实收资本的比例表示非港澳台地区外资 (*FDI_Other*)。表 5 显示, 无论对企业出口 GVC 位置还是进口 GVC 位置, 非港澳台地区外资均呈现更为显著的负向影响。这一结果与 Buckley 等 (2007) 的结论不同, 其可能原因在于: 本土企业与非港澳台地区外资企业在制度环境方面的巨大差异, 使得内资企业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时需付出巨额成本, 而技术水平方面的巨大差距加剧了本土企业对于国外先进技术的依赖性, 形成非正向的技术溢出, 从而对于本国内资企业的 GVC 位置具有更加显著的负向影响。港澳台企业与内地企业在历史文化传统等方面的联系更为紧密, 其产品与内地产品竞争激烈, 倒逼内资企业提升技术水平 (李怡和李平, 2018),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内地企业 GVC “低端锁定” 困境。

3. 不同贸易方式企业的异质性分析

由表 6 结果可知, 以企业出口 GVC 位置与进口 GVC 位置作为被解释变量, 三种贸易方式中 FDI 系数均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其中, 一般贸易样本 FDI 系数的绝对值均大于加工贸易与混合贸易, 表明 FDI 对一般贸易企业的进出口 GVC 位置的负向影响较强, 而加工贸易与混合贸易企业进出口 GVC 位置所受到的负向影响较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 2008 年金融危机后, 中国大量的加工组装环节转移至越南等发展中国家, 并逐渐承接来自外资的核心零部件生产环节, 中国产业实现 “腾笼换鸟” (周彦霞等, 2021), 外资对于加工贸易企业 GVC 位置的冲击有

所减弱；另一方面，混合贸易企业同时从事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行为，可以有效分散风险，在面临金融危机等重大冲击时，其 GVC 位置受外资的影响较弱。

表 6 异质性分析：区分贸易方式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加工贸易	一般贸易	混合贸易
	(1)	(2)	(3)	(4)	(5)	(6)
<i>FDI</i>	-0.051 7*** (0.000 9)	-0.054 1*** (0.000 5)	-0.051 1*** (0.000 6)	-0.048 9*** (0.000 8)	-0.054 9*** (0.001 1)	-0.053 0*** (0.000 6)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2 770	252 059	95 142	55 324	82 051	138 303
R ²	0.553 2	0.434 5	0.560 5	0.363 6	0.194 1	0.391 0

4. 不同地区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表 7 显示 FDI 对西部地区企业出口与进口 GVC 位置的负向影响较强，而东部地区企业的 GVC 位置受到 FDI 的负向影响则较小。其可能的原因在于：东部地区企业与国际市场联系紧密，更加接近技术前沿，抗风险能力普遍较强，在 GVC 中的位置受外资变动的的影响较小。中西部地区从事进出口行为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多面向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联系较弱，相对远离技术前沿，抗风险能力较弱。2008 年金融危机后，来华 FDI 逐渐由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中西部地区凭借其资源与劳动力优势承接了大量来自东部地区的加工贸易企业，更易受外资“俘获效应”的影响而被锁定在 GVC 低端位置。

表 7 不同地区企业的异质性检验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1)	(2)	(3)	(4)
<i>FDI</i>	-0.052 6*** (0.000 4)	-0.050 6*** (0.001 7)	-0.058 1*** (0.002 7)	-0.056 6*** (0.002 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29 323	21 984	13 378	15 989
R ²	0.490 1	0.402 7	0.377 3	0.382 1
项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东北地区
	(5)	(6)	(7)	(8)
<i>FDI</i>	-0.052 7*** (0.000 4)	-0.059 1*** (0.002 3)	-0.059 5*** (0.003 7)	-0.050 1*** (0.002 3)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252 924	11 441	8 156	12 980
R ²	0.308 8	0.257 7	0.259 0	0.255 0

(四) 机制检验

1. 吸收能力

根据前文的理论机制分析,下文从两个维度对吸收能力进行衡量:一是以技术差距(Gap)表征企业吸收能力中的研发能力维度,其公式为: $gap_{fi} = LP_{fi} / \max(LP_{fi})$,即企业*f*的劳动生产率与其所属行业*i*劳动生产率最大值的比值^①。变量Gap的数值越大,表示企业越接近行业前沿水平,其吸收能力越强。二是人力资本(HC),以企业职工工资与员工人数的比值的对数表示。

为了检验吸收能力机制的影响,回归模型中分别加入两种吸收能力与FDI的交互项,结果如表8所示。以出口与进口GVC位置为被解释变量,表8列(1)和列(4)结果显示,交互项 $FDI \times Gap$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结合FDI系数均显著为负的结果可知:若企业自身的技术水平越接近行业前沿技术水平,企业的研发能力越强,则FDI对于企业出口和进口GVC位置的提升作用越强;若企业的技术水平与行业前沿水平差距过大,企业学习和吸收外来技术与知识的能力越弱,FDI则会阻碍企业出口与进口GVC位置的提升,甚至造成企业被锁定在GVC的低端。列(2)与列(5)结果显示,交互项 $FDI \times HC$ 系数均显著为正。结合FDI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的结果可知:企业人力资本水平越高,FDI促进企业出口与进口GVC向高端提升的效应越强烈;人力资本水平越低,FDI则会抑制低人力资本企业出口与进口GVC位置的提升,甚至造成本土企业的“低端锁定”。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说1,同时为基准回归结果提供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样本中多数企业学习与吸收外来技术的能力过低,未能真正将习得的先进技术与知识转化为自身的生产力,从而使得自身被优势外资锁定在GVC的低端环节。

2. GVC 嵌入程度

本文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加入全球价值链参与度、FDI与GVC参与度的交互项进行回归,以检验全球价值链嵌入程度这一机制的影响。区分内外资的企业层面

GVC参与度构建如下: $GVC_par_{fi}^X = \sum_{i=1}^N \frac{X_{fi}}{X_{fi}} GVC_for_{fi} + \sum_{i=1}^N \frac{X_{fi}}{X_{fi}} GVC_back_{fi}$,
 $GVC_par_{fi}^M = \sum_{i=1}^N \frac{M_{fi}}{M_{fi}} GVC_for_{fi} + \sum_{i=1}^N \frac{M_{fi}}{M_{fi}} GVC_back_{fi}$,其中各项的含义与式(2)和式(3)相同。

如表8列(3)与列(6)所示,以出口和进口GVC位置为被解释变量,交互项 $FDI \times GVC_par$ 的系数均显著为负。结合FDI系数均显著为正的结果可知:当企业尚未深度参与GVC分工时,外资的进入能够促进企业出口和进口GVC位置的提升;当企业过度依赖GVC分工时,外资则会利用其优势地位抑制企业出口和进口GVC位置的提升。上述结果验证了假说2,同时从另一视角解释了基准回归结果可

^①由于企业增加值数据在部分年份有缺失,本文用企业总产值与员工人数的比值衡量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能的原因：中国企业过度依赖 GVC 分工，外资为维持自身优势地位，利用 GVC 使得中国企业陷入“低端锁定”困境。

表 8 机制检验结果

项目	企业出口 GVC 位置			企业进口 GVC 位置		
	技术差距	人力资本	GVC 嵌入	技术差距	人力资本	GVC 嵌入
	(1)	(2)	(3)	(4)	(5)	(6)
<i>FDI</i>	-0.053 0*** (0.000 4)	-0.057 0*** (0.000 7)	0.023 3*** (0.001 5)	-0.053 0*** (0.000 4)	-0.057 0*** (0.001 0)	0.021 4*** (0.002 3)
<i>Gap</i>	-0.002 8*** (0.001 0)	—	—	-0.005 3*** (0.001 8)	—	—
<i>FDI</i> × <i>Gap</i>	0.007 5*** (0.001 7)	—	—	0.004 0* (0.002 3)	—	—
<i>HC</i>	—	0.000 1 (0.0001)	—	—	-0.000 3 (0.000 2)	—
<i>FDI</i> × <i>HC</i>	—	0.001 3*** (0.000 2)	—	—	0.0012*** (0.000 3)	—
<i>GVC_par</i>	—	—	-0.029 3*** (0.007 9)	—	—	0.053 7*** (0.007 1)
<i>FDI</i> × <i>GVC_par</i>	—	—	-0.240 1*** (0.005 4)	—	—	-0.227 5*** (0.007 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数	380 677	356 804	380 677	285 505	269 382	285 505
R ²	0.477 0	0.477 9	0.511 0	0.301 7	0.305 5	0.314 9

五、结论与对策建议

本文基于 OECD 跨国企业活动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海关数据库匹配数据，运用区分内外资的增加值贸易核算框架构建企业层面的 GVC 指标，实证检验了 FDI 对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 GVC 位置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主要研究结论如下：（1）FDI 对企业出口与进口 GVC 位置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经过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2）FDI 显著提升了内资企业出口 GVC 位置与外资企业进口 GVC 位置，在非港澳台企业、一般贸易企业与西部地区企业分样本中 FDI 对于企业 GVC 位置提升的抑制效应更为显著。（3）吸收能力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吸收能力超越一定的门槛值时，FDI 对于企业 GVC 位置的提升效应越强，反之则会削弱这种提升效应，甚至造成本土企业 GVC 低端锁定困境。（4）GVC 嵌入程度发挥负向调节作用，当企业参与 GVC 未超过一定限度时，外资进入能够促进企业 GVC 位置的提升；当企业过于依赖 GVC 分工体系时，FDI

对于企业 GVC 位置的提升作用被削弱,甚至造成外资对于本土企业的 GVC 低端锁定。

本文基于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重新审视 FDI 对中国企业 GVC 位置提升的作用效果,稳定引资数量,注重引资质量。建议从外资驱动价值链升级的方式转变为“内资驱动、外资辅助”的方式,在内资控股的前提下充分发挥 FDI 促进内资企业出口 GVC 地位提升的积极作用,进一步引导外资由“加工模式”向“研发生产模式”转型,弱化跨国公司投资对中国企业进出口产品的“低端锁定”。(2)通过增强企业的吸收能力,实现引进外资与中国企业 GVC 升级的协同发展。一方面加大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投入,完善人才引进政策,培育本土高水平人才与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双管齐下,为加强内资企业的竞争力和吸收能力提供人力资本保障;另一方面开放式利用社会资本,运用产学研合作等手段增强企业消化、吸收前沿知识与技术的能力,缩小本国企业与高技术水平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3)减少对于 GVC 的过度依赖,防止外资利用 GVC 将中国本土企业锁定在低附加值环节。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和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新发展格局下,加快构建强有力的国内价值链,不断整合国内资源,实现企业 GVC 嵌入由加工、装配等低端环节嵌入方式向研发、设计等高端环节嵌入方式转变。此外,避免中国企业对 GVC 的过度依赖有利于抵御 GVC 中的不确定风险冲击,保证企业的稳定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艺毛,李春艳.国际知识溢出对我国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影响[J].经济纵横,2019(11):115-129.
- [2]李平,江强,林洋.FDI与“国际分工陷阱”——基于发展中东道国GVC嵌入度视角[J].国际贸易问题,2018(6):119-132.
- [3]李怡,李平.FDI对中国工业价值链升级影响的异质性考察[J].世界经济研究,2018(5):37-50+135-136.
- [4]罗伟,吕越.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影响[J].世界经济,2019,42(5):49-73.
- [5]聂辉华,江艇,杨汝岱.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的使用现状和潜在问题[J].世界经济,2012,35(5):142-158.
- [6]苏丹妮,盛斌,邵朝对,等.全球价值链、本地化产业集聚与企业生产率的互动效应[J].经济研究,2020,55(3):100-115.
- [7]唐宜红,张鹏杨.FDI、全球价值链嵌入与出口国内附加值[J].统计研究,2017,34(4):36-49.
- [8]唐宜红,张鹏杨.中国企业嵌入全球生产链的位置及变动机制研究[J].管理世界,2018,34(5):28-46.
- [9]屠年松,曹宇芙.知识产权保护对服务业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研究——基于OECD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软科学,2019,33(6):37-41+48.
- [10]王玉燕,林汉川,吕臣.全球价值链嵌入的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中国工业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4(9):65-77.
- [11]肖利平,谢丹阳.国外技术引进与本土创新增长:互补还是替代——基于异质吸收能力的视角[J].中国工业经济,2016(9):75-92.
- [12]闫云凤.中国内资和外资企业在全价值链中的嵌入位置与演进路径研究——基于行业数据的测度[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0,22(3):3-18.

- [13]张宇,杨松.FDI对可再生能源产业全球价值链地位非线性作用研究——基于研发投入门槛效应视角[J].软科学,2020,34(3):12-17+24.
- [14]周申.贸易自由化对中国工业劳动需求弹性影响的经验研究[J].世界经济,2006,29(2):31-40+95.
- [15]周彦霞,张志明,陈嘉铭.亚太价值链重构与中国的角色变迁[J].世界经济研究,2021(4):28-42+134-135.
- [16]AMENDOLAGINE V, PRESBITERO A F, RABELLOTTI R, et al. Local Sourcing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Rol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and Global Value Chains[J]. World Development, 2019, 113: 73-88.
- [17]BUCKLEY P J, CLEGG J, WANG C.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ward FDI and Spillover Effects Linear? An Empi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Case of China[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7, 38(3): 447-459.
- [18]CHOR D, MANOVA K, YU Z. Growing Like China: Firm Performance and Global Production Line Position[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21, 130: 103445.
- [19]COHEN W M, LEVINTHAL D A. Innovation and Learning: The Two Faces of R&D[J]. The Economic Journal, 1989, 99(397): 569-596.
- [20]DUAN Y, LIU S, CHENG H, et al.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bsorptive Capacity on Transnational Knowledge Spillover and the Innovation Quality of High-tech Industries in Host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Manufacturing Industr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oduction Economics, 2021, 233: 108019.
- [21]FEENSTRA R C, HANSON G H. Globalization, Outsourcing, and Wage Inequal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96, 86(2): 240-245.
- [22]FERNANDES A M, KEE H L, WINKLER D E. Determinants of Global Value Chain Participation: Cross-country Evidence[R]. World Bank 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No. 9197, 2020.
- [23]FERNANDES A M, PAUNOV C.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Services and Manufacturing Productivity: Evidence for Chile[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2012, 97(2): 305-321.
- [24]GROSSE R. International Technology Transfer in Services[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1996, 27(4): 781-800.
- [25]HADLOCK C J, PIERCE J R. New Evidence on Measuring Financial Constraints: Moving Beyond the KZ Index[J].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010, 23(5): 1909-1940.
- [26]HALPERN L, KOREN M, SZEIDLA. Imported Inputs and Productivity[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 105(12): 3660-3703.
- [27]JAVORCIK B S. Doe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crease the Productivity of Domestic Firms? In Search of Spillovers through Backward Linkages[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4, 94(3): 605-627.
- [28]JUDE C. Technology Spillovers from FDI. Evidence on the Intensity of Different Spillover Channels[J]. The World Economy, 2016, 39(12): 1947-1973.
- [29]KOOPMAN R, POWERS W, WANG Z, et al. Give Credit Where Credit is Due: Tracing Value Added in Global Production Chain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16426, 2010.
- [30]NARASIMHAN O, RAJIV S, DUTTA S. Absorptive Capacity in High-technology Markets: The Competitive Advantage of the Haves[J]. Marketing Science, 2006, 25(5): 510-524.
- [31]SU H, FU Y. The Impact of the Outward and Inward FDI on Global Value Chain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Issues, 2021, 11(6): 1-8.
- [32]UNCTAD. 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21[R]. United Nations, 2021.
- [33]WANG Z, WEI S J, YU X, et al. Tracing Value Added in the Presence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29335, 2021.
- [34]WANG Z, WEI S J, ZHU K. Quantifying International Production Sharing at the Bilateral and Sector Levels[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Working Papers No. 19677, 2013.

Does the Entry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hance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Re-examination Based on the OECD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Database

WANG Wenzhi¹, LU You²

(1. School of Economics,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2. School of Economics,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Abstract: Based on the matching data of the OECD Activity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the Chinese Industrial Enterprise Database and the Customs Database, this paper applied trade in value-added decomposition model distinguishing between domestic and foreign investment to construct firm-level global value chain indicators, and empirically tested the impact of FDI on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and its mechanism.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FDI generally inhibit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where the absorptive capacity of enterprises plays a positive regulatory rol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shows a negative regulating effect. The results of heterogeneity test suggest that FDI significantly improves the position of domestic-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exports and the position of foreign-owned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of imports. FDI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nhibitory effect on the position promotion of general trade enterprises and western region's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DI from outside of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has a relatively strong negative impact on the posi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in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word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Enterprise's Posi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 Absorptive Capacity; Global Value Chain Embedding

(责任编辑 刘建昌)